



芦苇丛书

张欣 主编

乡情小札

● 张宇航

广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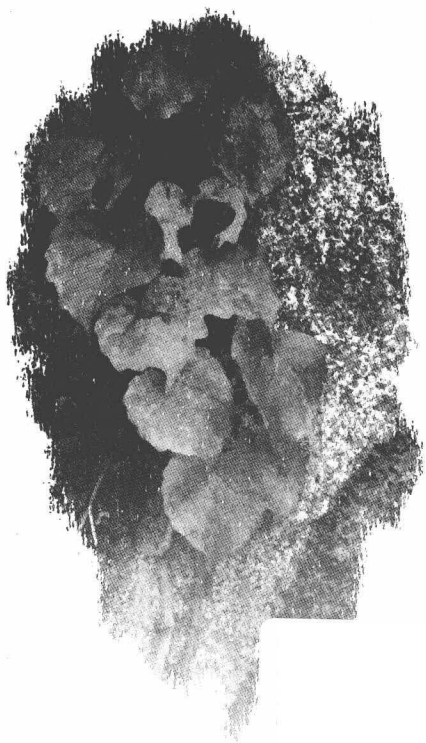


芦苇丛书

张欣 主编

乡情小札

● 张宇航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情小札 / 张宇航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6. 5
(芦苇丛书)

ISBN 7-80731-175-4

I.乡…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9971 号

书 名 乡情小札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文 菁

装帧设计 刘伟建

印 刷 广州市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东工业区 邮政编码:510663)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731-175-4 / I·27

定 价 23.80 元

总序

陈建华

广州市作协策划出版一套“芦苇丛书”，我个人以为，这个想法很好，这项工作值得做。“芦苇丛书”的出版，其政治意义在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努力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境界，为营造和谐社会做一点实事。其文化意义在于：褒扬本土文化和扶持本土作家，让岭南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实绩。

岭南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纵观近代历史，这里曾生长出像黄遵宪、丘逢甲、郑观应、张荫桓、容闳等一批民族栋梁，更遑论“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片曾经葳蕤茂盛的文化湿地，以她自己独有的方式再续写和继承人文传统。

平心而论，地处岭南腹地的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成就了广州的辉煌，而广州的辉煌是凭借文化传承下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一直处于狂飙激进式的经济变革之中

心,创造了无数个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作为广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对确立广东在全国一盘棋上的领军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乃民族之魂,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以文化论输赢。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经济要开放,文化也要开放,正如两个轮子同步,列车才能高速前进的道理一样。

执政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必须深刻认识到:诚如经济改革有经济改革的规律一样,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文学也有它自己的规律,那就是:表现形式更加多元,思维格局更加开放,观察视角更加人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头戏,文化事业的兴衰,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创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超越及思想等内在价值的提升。因此,她义不容辞地应该做到:扶持和关注那些弱小的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文学幼芽,使之沐浴到充分的阳光雨露,即便成不了参天大树,也是一株净化空气、绿化家园的可爱植株。据我所知,在广东,尤其是广州,活跃着一大批有抱负有才华的文化精英,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勤勉地耕耘着,思想之树长青,果实甘美多汁,但却因种种原因“养在深闺无人知”。“芦苇丛书”的出版将会改善这种现状,为广州的作家提供了一个让其作品与世人见面、与社会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这是一个极富创意和时代特色的探索。

提到芦苇,人们自然就会怀念一个人:帕斯卡尔。他在著名的《思想录》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但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但芦苇还让我想起另一个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当他从天庭为人类盗得火种后,就是把它藏在一截芦苇管里投奔人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说,芦苇还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期待“芦苇丛书”能名符此实,不负使命。

鉴上所述,欣然捉笔,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札记一：故土熏风

- 槎龙村纪事 / 3
走出城头里 / 6
珍藏一段情 / 10
父亲与兰 / 13
找到了秀儿 / 15
黄花魂 / 19
海·岛·人 / 24
有个女孩名叫雪青 / 27
淡淡的乡愁 / 34
天工造化丹霞山 / 36
瑶山鼓响 / 39
“喀古”病了 / 41
瑶山过年 / 44
风情戈洛琅 / 47
漫漫瑶山路 / 50
瑶家女教师 / 54

札记二：牵挂草原

- 彩虹索龙嘎 / 61
龙梅新传 / 64
都贵玛额吉 / 69
马头琴声像小河 / 72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 80
情系阿拉善 / 83
梭 梭 / 87
进沙子 / 90
月亮湖 / 92
美丽的腾格里，忧伤的腾格里 / 94
寻找艾敏河 / 98
“爱自己的孩子的是人，
爱别人的孩子的是神” / 101
大雁的歌 / 108
回家吧，老家有座蒙古包 / 111
草原日记 / 115
花的命运 / 124
风中的格桑花 / 128
少女拉姆的故事 / 133
额尔德尼 / 137
哦，香巴拉并不遥远 / 141
大漠胡杨 / 144
传歌者 / 149

札记三：风铃，风铃

- 梅关古道·曲江风度 / 155

八个月与一千年 / 158

民心如镜 / 161

大忠袁崇焕 / 164

莲花峰 / 166

宁静的流溪河 / 168

国徽, 国徽 / 169

平淡才是真潇洒 / 171

远去的母亲 / 174

守护善良 / 176

风铃, 风铃 / 178

斑鸠声声 / 180

山兰幽香 / 182

太阳枷 / 184

大田顶抒怀 / 186

云雾石坑崆 / 188

心中的大宁河 / 190

坎坷如歌 / 193

岁月如梭 / 195

心静如水 / 197

敬能慑身 / 199

贪泉可试心 / 201

歌诗合为自然赋 / 203

无字碑 / 206

岭南漠北文学缘 / 208

逝去的与活着的 / 210

弱者与强者 / 212

记住昨天 / 214

珍惜今天 / 216

为了明天 / 218

札记四：峡湾无月

岚山雨潇潇 / 223

富士山下庆“十一” / 225

海的女儿们

——北欧纪行之一 / 228

维尔兰雕塑公园

——北欧纪行之二 / 232

峡湾无月

——北欧纪行之三 / 235



札
记
一

故
土
熏
风

槎龙村纪事

人到中年,怀念故乡的时候就多起来了。

我的故乡在广州市郊石井槎龙村。以往这里叫石井人民公社槎龙大队,后来称白云区石井镇槎龙村委,再后来改为松洲街槎龙社区。无论建制如何,槎龙这个地名一直没变。

大约从我三岁开始,我便随父母离别故乡,到外地居住和生活,直到二十岁,期间回乡甚少。印象中故乡虽然距广州城区不远,交通却十分不便,要在西场电厂码头乘轮渡溯松洲江而上,四十多分钟才到。有时误了班船,就坐小艇,由船工吱呀吱呀地摇橹划桨,折腾几个小时。少不更事的我,并没有觉得两岸的田园风光多么美,划船的大爷大婶多么累,只是嫌路途过于单调、烦闷,自然生不出什么诗情画意来。等到船从松洲江驶进石井河,绕过那座名叫文昌阁的白塔,慢慢靠向大榕树下的石阶,才欢呼着跳上岸去。槎龙码头真有一个石刻的马头,连同民国年间建的“槎溪”(据说由某位秀才用蔗渣沾上墨汁信手题写)石碑坊,几十年来默默地立在河边,迎来送往,见证着故乡历史的巨变。以后修通增槎公路和 107 国道,分别从村子的东面、西面绕过,才有了通公共汽车的便利。

河流可以改道,景物早已换颜,昔日村子周边的菜田已建满了

楼房,用竹簸箕在小水沟中捞“花手巾”(一种五颜六色的小鱼)的童趣也不再有。能记载岁月流淌的,恐怕只有这些石马头、石碑坊了。

4 父母亲年近退休时,先后调回故乡任教。我在外地求学、工作,直至在省级机关当了个小官,村里人都不知道;间或回乡探望父母,也是“悄悄地进村,开枪的不要”,没惊动书记村长。我是向来不事张扬,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里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市驻村工作队队长是我在中学教书时的老同事,非要让我回乡给农村基层党员、村干部讲讲廉政建设课不可,父老乡亲们才晓得,村小学孔老师(我母亲)的儿子原来在省里做事。从此,每逢春节来临,镇、村召开迎春座谈会,总忘不了通知我一声。我也尽量参加,乐得有个机会与乡亲们聊聊天。

故乡这些年变化确实日新月异。沿 107 国道两旁全是水果、蔬菜、三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客商云集,物流业十分兴旺。产品通过这里集散,流向广州市区、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甚至国外。批发市场的背后,是一排排厂房,生产泡沫塑料、纸箱、压塑制品,为村集体创造大量财富。乡亲们的生活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五六层高的矮楼从四周包围着我家那间青砖老屋,形成两个不同时代的鲜明对比。每每看在眼里,心中就充满了对故乡和乡亲的羡慕之情。有时想,在外当官干不出什么名堂,不如回乡做个农民,可能活得更加写意呢!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故乡这些年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还营造了浓厚的精神文明氛围,使归来的游子看到一片既富裕又文明的新景象。农民公园、球场、老人活动中心等硬件设施自不待说,光是村里花数百万元建成、被白云区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彭加木纪念公园,就应该大书一笔。上个世纪,槎龙村出过三位名人,他们是大革命时期英勇献身的林成佑烈士、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悦楷和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彭加木。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说,这彭家与

我家还真有点沾亲带故，细细算来我要称他为表叔。加木先生长年累月投身祖国科学事业，不顾疾患痛苦坚持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最后无声地消失在浩如烟海的戈壁黄沙中，给乡人留下一世英名。家乡人民缅怀他的功绩，为他建起了塑像和纪念馆，连同他的部分遗物、工作和生活照片，用来教育后人艰苦创业、崇尚科学、精忠报国。我曾多次回乡，在彭加木的塑像前流连忘返，感受故乡人的骨气、大气，探索人生与事业的关联；又思考加木先生为什么会为大西北如此钟情，莫非祖上与草原大漠曾有过不解之缘？

这一问题最终在槎龙人身上找到答案。村党总支部张国浩、彭启廷、张丽影等领导，听我介绍地处祖国西北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的情况后，不但热情接待了来自鄂托克前旗的旗委副书记刘恒发一行，带他们考察了村里的批发市场，为鄂前旗的土豆、辣椒等农产品联系销售档口，而且千里迢迢奔赴内蒙古，回访蒙古族兄弟，还资助了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糜地梁嘎查（村）七名贫困儿童读书。我也把内蒙古草原作为第二故乡，年年回草原一趟，并正与广东热心人士共同帮助草原上更多濒临失学的孩子，走完求学之路。

据说张姓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擅长射箭，被封为“弓长”，后来用这官名合并为姓。槎龙村张姓都属“清河堂”的，正宗由山西南移，因而与大西北、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同胞心心相印，亦在必然。从政治上看，这也算得上是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吧。其实槎龙人的感情是最为朴素的，他们没有什么高谈阔论，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做着该做的事，致富了仍不忘记贫困的农民兄弟而已。表现出来的，还是那种天下为公、“你有我有全都有”的追求，那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信念。

走出城头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农村中小学当教书匠的父母,用微薄的工资养育着我们兄弟四人。

那会儿,全家六口人挤住在广州市郊区竹料公社竹一大队一间旧祠堂中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边房里。祠堂是生产队的财产,租给公社中学做教师宿舍。房间里没有厨房,更不可能有卫生间,煮了饭菜要端着走过几户邻居,晚上上厕所还得摸黑跑到几十米外。屋门口与青石板铺成的小巷隔了一条“大坑渠”(排水沟),两头各连着鱼塘。平时渠内都是臭水、淤泥,脏得很,也没有人自觉地去清理。到了下大雨的季节,地势高的鱼塘水满溢出闸口,顺坑渠流向地势低的鱼塘,才把渠里的脏物冲个干干净净;渠水还夹带了好些小鱼小虾,用塑料丝编成的网兜或者竹簸箕捞上来,洗洗后煮熟吃,就是普通人家一顿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了。因此我们几兄弟都盼着下大雨,有时晚上在渠里捞鱼,高兴得忘了明天还要上学必须早点睡觉,于是便招来父母的批评责骂,急忙收起网兜小桶,乖乖地泡脚上床。

入巷处有座石砌的牌坊,刻着“城头里”三个大字,落款为“咸丰三年正月重修”,够古老的了。牌坊门口虽然宽不足三米,却是村

里姑娘出嫁等喜庆大事必经的场所。那个比我长五岁的同村女孩秀儿,就是在这里被亲朋戚友簇拥着坐上新郎的自行车,嫁到遥远的地方去的。出巷不到二百米,是父亲工作的单位;而离母亲教书和我们读书的公社中心小学,则还有一公里路。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天都来回一趟。这条路我们走了多年,哪里有一块石头,哪里坑坑洼洼,都记得一清二楚。

家里的老四出生于1962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家里不像当地社员有自留地可种些瓜菜之类帮补生活,柴米油盐吃穿住,全由父母那点工资打发;老四又生不逢时,身体素质较差,患了病常常让我背着到公社卫生院求诊,手头就更为吃紧。平日里父母工作很忙,特别是后来参加“四清”运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买菜做饭照顾三个弟弟的活,自然便落在我这个大哥头上。除了精打细算一分钱一分钱抠着花外,我们课余拾枯枝树叶、下流溪河摸鱼虾捞黄沙蚬、到田里捡生产队收剩的番薯花生,想尽千方百计找点烧的吃的。有时还到圩场捡荔枝核晒干卖给收购站,五分钱一公斤;或者从收购站领些拆解蓑衣(农民披在身上的、用树叶和麻绳穿成的雨衣)、洗旧瓦片的活来干,挣回几毛钱。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会对女儿说起那个“一元钱”的故事:我把买菜钱的零头积攒成一元钱,揣在兜里舍不得花。因为母亲每个月到了学校发工资的前两天,就已经荷包空空没钱买菜,要向我“借”这一元钱,作为全家的伙食费,度过最困难的日子。领到工资后,母亲又还回我一元钱,待下个月七八号再“借”。我的女儿从故事中学会知怪识俭,明白了“嚼得菜根者能成百事”的道理。当然这是后话。

人生如梦。转眼间我们兄弟四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妻儿,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了自己的事业。父母都盼着孩子快点长大,却没有想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就老了。

1979年,我从中学调到检察院工作。三个弟弟则分别参军、当警察、当法官。有一次,我们相约穿上各自的制服,到东湖公园照